

补齐“创新治理”的“社会短板”

□ 李 研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新论断。全会公报除了在总目标中提出“治理”这一概念外,还在其他部分如发挥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优势需要“政府治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创新社会治理”中多次使用这一名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那么,究竟什么是治理?强调治理意味着什么?治理对于我国科技创新工作又有哪些启示呢?

“治理”一词来源于公共管理领域。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私人的机构和组织,管理共同事务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与其说治理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治理是一种理念。治理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为促进一国经济社会

发展,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其合作将产生“1+1+1>3”的效果。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社会组织的网络能力,能够相互匹配、彼此补充,协同推进国家向着更好的、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治理理念和创新体系理论在逻辑上有相通之处,二者都强调主体间的分工、配合与协同。国家治理体系内,创新不再只靠市场和政府力量推动,还依靠社会本身具有自组织能力。社会组织非盈利性、非政府性的特点,决定了它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域”发挥独特作用。例如,基金会作为一种民间筹款机制,可以投资被政府和企业忽略的科学研究领域,形成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科技社团作为科技工作者的社会组织,能够提供科普、信息

等公共服务;行业协会可以架起沟通企业和政府的“桥梁”,充分发挥政策协调职能,促进创新政策的有效落实。

回顾我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大多数改革发生在经济领域,而“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我们经历了由政府主导下的“研发管理”到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转变。如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创新治理”,应成为今后我国科技创新工作的一条新思路。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政府在营造创新环境、组织实施国家战略导向的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主导作用;要继续完善、巩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尽快补齐社会组织促进创新方面的“短板”,形成三方共同

参与的创新治理新格局。

当前,包括科技类社会组织在内的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正在我国全面铺开,社会组织发展正面临重大机遇。由于社会组织包含的类型多、可发挥作用的的空间大,接下来急需做的一项工作是通过观察社会组织在我国和发达国家促进创新的实践,及时总结到底哪些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创新治理”的参与者。这项“收窄”范围的工作,将对下一阶段发现我国科技创新工作新的抓手,具有直接和现实的意义。

去年年底,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我国首家科技类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挂牌成立了。如今,伴随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在科技创新领域将会上演一部怎样的“创新治理”大戏,让我们拭目以待。

用“创新消费”扩大内需

□ 王晓松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出口大幅萎缩,而另一大动力——投资同样饱受诟病。为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被寄望于消费,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推崇。

然而,对于消费拉动的主张却遭到了不同的声音。有观点认为,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不应该学习消费拉动增长的西方模式,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对资源的定价根本就是免费的,如果走消费拉动增长的模式,无异于是对自然资源的另一种形式的掠夺,也将很快达到增长极限。

中国提出消费拉动当然不是走西方的模式。因为我们很清楚,中国本身的资源状况与人口实际都决定了不可能像欧美那样过度的消费。但在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的实际消费水平提升不高也是事实。并且,中国内需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确实有待进一步的发展,用内需市场代替出口是中国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消费拉动本身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大的经济政策导向,是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亿万民众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

当然,反对消费拉动的观点也有值得我

们反思的地方。中国经济发展要健康发展,不能只要消费不要投资,而是应该对投资的导向进行新的调整。诚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讲的,经济增长最终要靠技术创新带来新产业、新产品和更高的附加值。这也是中国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的根本所在。技术创新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直接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所以,把投资引导到技术创新中来,让资本更多地支持技术创新,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强大的动力。

但是,资本又是逐利性的。利润率是吸引

浅谈生物育种科技竞争力

□ 黄大防

生物育种又称转基因生物育种,是集转基因、分子标记、杂交选育等方法于一体的先进育种技术。“转基因生物育种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战略选择”的立论,一是基于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大需求的综合判断,二是出于对增强我国农业科技竞争力的全面考量。对于前者,此前已有诸多论述,这里仅就科技竞争力问题谈一点认识和体会。

众所周知,转基因生物育种已作为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付诸实施,并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于这一领域科技竞争力的内涵和要素是什么,未见专门论述和统一说法。本人觉得应对核心技术(特别是功能基因、调控元件、遗传转化和分子标记技术)、研发体系、人才队伍、产业化速度与规模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以此作为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标志。

抗虫棉研发提升了我国生物育种的科技竞争力

拥有抗虫基因、转化技术和受体良种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棉研发是我国发展转基因育种技术、打破跨国公司垄断、抢占国际生物育种制高点的成功事例。抗虫棉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有效控制了棉铃虫的猖獗危害,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棉花产业,更重要的是,通过与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我国成功打造了一个包括基因发掘、遗传转化、安全评价、品种选育、产业开发,直至生产推广应用在内的、比较完整

的转基因育种研发体系。

正是依靠这个体系,国产抗虫棉仅用了短短6年就实现了国内市场占有率的逆转,并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抗虫棉的育成使我国转基因生物育种进入了国际前列,成为我国农业科技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标志。正是依靠抗虫棉打下的基础,我国已成为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转基因作物自主研发能力的国家,并为后来包括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作物在内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研究的全面部署奠定了基础。

粮食作物生物育种产业化的滞后削弱了科技竞争力

美国一直把发展生物技术作为科技的核心竞争力。1996年以后跨国企业将商业化育种的重点转向粮食作物,使玉米和大豆单产一下提升了25%,目前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种植面积已分别超过两种作物总面积的90%和93%。

此外,复合基因作物已成为转基因新品种的主体,抗旱节水、医疗保健用的新一代转基因作物即将投入市场应用。如孟山都公司近年通过科技创新、企业并购、资本渗透等手段一跃成为全球农业生物产业之巨头。该公司连续四年生物育种年投资超过10亿美元(相当于我国5家A股上市种子子公司研发总投入152倍);产品销售额自2010起突破100亿美元,2012年,增至135亿美元(超过我国近6000家种子企业的总产值)。

再如与我国同属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巴西

抓住生物技术蓬勃发展的机遇,自2005年起大力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2012年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种植面积已达3660万公顷(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10倍),位居世界第二,增速更是跃居世界第一。生物育种已成为推动巴西农业和世界发展的主要引擎。

然而,相比之下由于近年受到所谓“转基因安全”争议的影响,我国粮食作物生物育种产业发展政策却趋于保守,虽然大量研究证实植酸酶玉米、抗虫水稻等转基因作物不存在任何安全问题,却迟迟未能推广应用。实际上在棉花之后我国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大宗作物的种植,我国生物育种的产业化至少被推迟了10年!产业化停滞不前必然导致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近年我国生物育种整体水平与美国的差距重新拉大,发展速度与应用面积竟落到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后。转基因科技竞争力的削弱最终也导致我国农业对国际市场整体依赖程度不断增加,难以阻挡国外转基因大豆、玉米的大举进入。目前我国大豆需求的80%靠进口;重要粮食作物自给率实际上已跌破95%的底线;农业种子市场更陷于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生物育种的产业化已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令人担忧。

把握好重新提升转基因生物育种科技竞争力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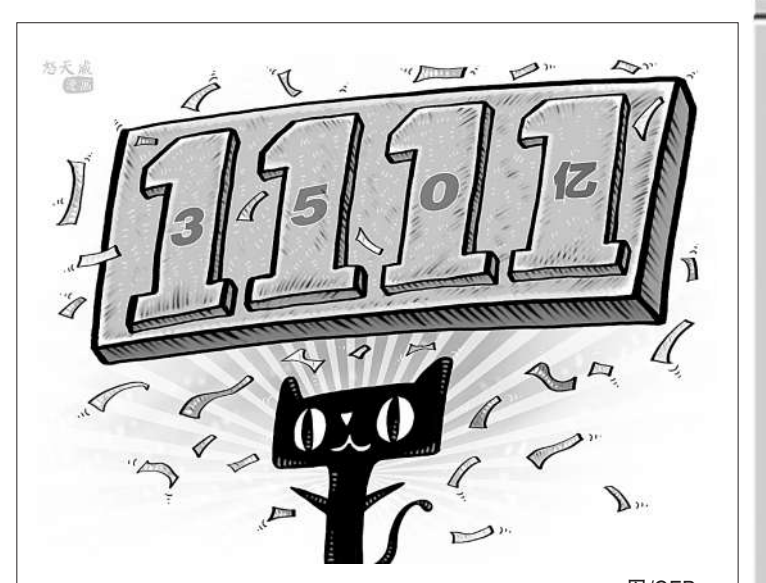
面对新一轮国际高技术竞争的严峻形势,我国若想争取主动,当前首要的措施是正确引

导生产总值超过24000美元。

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伊斯兰教义起家的正义与发展党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上台执政以后,在反思凯末尔世俗化改革、应对西方民族国家观念挑战的同时,也开始重新探讨西方的影响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1989年至1993年期间担任土耳其总统的厄扎尔提出了“土耳其-伊斯兰”一体概念,认为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对土耳其的国家地位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伊斯兰文化是现代土耳其国家“软实力”的来源之一。

厄扎尔的外交政策被西方学者称为“新奥斯曼主义”,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在外交方面渐次呈现出的“中教化”倾向,则被视为“新奥斯曼主义”的全面实践。按照该党领袖、总理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顾问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的说法,这是为了纠正向欧美一边倒的不平衡外交,而发展土耳其的“战略深度”和“地缘深度”。当今的土耳其不再只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国家”,而必须担当“中心国家”的职责。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无所适从、身份撕裂的国家,但在达乌特奥卢看来,这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讲两种文明的语言”。

土耳其总理府副次长兼总理首席顾问易卜拉欣·卡伦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也提到,东西方文化交锋给土耳其带来了多元化。但土耳其这个外界眼中所谓的“桥梁国家”,其对外政策并不满足于桥梁和沟通作用。土耳其的历史以及全球化进程让土耳其拥有多种身份、多



图/CFP

双十一随想

□ 杨 雪

55秒,1亿;6分07秒,10亿;38分05秒,50亿;5时49分,100亿;21时19分45秒,300亿……11月11日当天支付宝成交总金额350.19亿。飞速攀升的数字,秒杀“去年今日”。飞速攀升的数字,秒杀“去年今日”。飞速攀升的数字,秒杀“去年今日”。

说来惭愧,我居然因为在电脑前张牙舞爪地抢购,不小心一杯水浇了我的苹果。擦过吹过放在那里干透,至今还没敢开机。如果电脑就此“报销”,虽损失惨重,但好在是身外物。据报道武汉一女子竟因抢购过度兴奋而引发心梗进了医院,所幸有惊无险。如果为此搭上身家性命,就实在不值得了。

一个发源于校园文化概念的“光棍节”炒作而来的商业营销手段,历经4年,已完成从小众噱头到大众狂欢的华丽转身。随着“节日”临近,各种调侃的段子纷至,有辛酸含泪的请假条,请求在家看着购物的媳妇;有男同胞的应对战术,连续三次输入错误密码锁住媳妇的支付宝。这个“炒”出来的节,已经对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双十一真是消费者的福音吗?未必。这其中也有不少陷阱:有的打折之前,已经暗中抬价;有的只是赚够人气,特价的都缺货;有的

商品低价,运费坑人……这一天,确实有一些便宜的好货,但不至于让人疯狂到跟不要钱似的。电商让利固然是引爆超购购买力的原因之一,而且其中也不乏“土豪”出没,但并不代表大众消费具有了如巨额数字所呈现的对等购买力。在为期24小时的消费狂欢背后,是平日里物价居高不下,收入有限的大众不能轻易消费,而要精打细算的寂寞和无奈。

即便要承担网购的各种风险,消费者仍然翘首企盼,甘之如飴。这对于门可罗雀的实体店而言,除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更是提醒,线上线下统一价格才是未来生存之道。另外,双十一的爆仓对于电商来说,也是一个启示:让利应该在每一天。

去年,马云和王健林曾打下亿元豪赌:马云认为到2020年,电子商务将取代传统实体店零售,占零售市场50%,王健林认为不可能。马云称,到2020年如果王健林打赌赢了,就意味着整个社会输了。

两位巨头的观点都只是一家之言,且看看热闹就好。但无论如何,350亿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阿里巴巴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不过对于房地产来说就是几块地钱。如果房地产一直是我们的经济支柱,社会将输掉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

“养老焦虑”,不单是钱的问题

□ 卢阳旭

时下,各种关于养老问题的讨论,纷纷扰扰、铺天盖地。其中,养老资金的筹集、管理问题获得了最多的关注,成为话题之王。毫无疑问,没有足够的钱,保障老年生活品质是向空话,但足够的钱只是老年人生活品质的一个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各种筹资方式的公众接受度和社会基础存在差异,一种筹资方式可能在技术上可行,但不被公众接受,没有社会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期公众对“常回家看看”和“以房养老”的“过度”关注,是人们对于现实讨论中“只谈钱”的戏谑和不满。

今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问候老人”——被媒体解读为“常回家看看”入法,引起吐槽一片。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开展老年入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即所谓的“以房养老”,一石激起千层浪。

虽然“常回家看看”,远非整部法律的核心条款,在效力上也基本属于提倡性规范,但公众对它的“过度”关注,恰恰反映了人们对于老年人的情感支持,特别是家庭中代际情感支持的关注。同样,所谓“以房养老”在文本中也只是寥寥数语,却吸引了与其篇幅很不相称的公众注意力。

从内容上看,上述两个话题,分别涉及保障老年人生活品质的两大支柱,即情感支持和资金支持,虽问题远未解决,但话题本身已不再新鲜。在本轮讨论中,公众之所以给予它们特别的关注,缘于它们此次直接触碰了家庭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这最敏感神经,公众的“养老焦虑”应激性地“过度”流露。

虽然不是唯一方式,但共同的家庭生活是老年人获得情感支持的主要途径。然而,现实的情况是,随着人口流动性提高,子女和父母的工作、生活半径在很多时候不再重合,甚至完全分

离。一方面,工作机会、生活方式、社交圈子的地域粘性,让很多年轻人确实回不去了,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在当下已失去了与之匹配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老年人脱离原来的生活圈子,改变长久以来养成的生活习惯,去重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会面临很多困难,甚至还会对其生活品质产生负面影响。

更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制度安排,不仅不去缓解这种变化给老年人生活品质带来的问题,反而设置了很多障碍(比如户口、社保、休假等)压缩个体和家庭可选择的空间,加剧了子女回不去、父母来不了,无法共同生活的问题。

如果说共同的家庭生活的缺失,还只是以一种相对隐蔽的方式改变家庭代际生活模式的化,那么,“以房养老”则直接挑战长久以来家庭代际间的财产关系及背后一整套家庭伦理。公众的激烈反应表明,养老资金的筹集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和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任何一种资金筹集、管理方式不仅需要考虑到能否筹到足够的钱,还要考虑到公众的接受度和它产生的社会影响。虽不能绝对地说谈钱伤感情,但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钱从来就不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向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与喜欢与否无关。

“桥梁国家”的转型与变革

□ 尹传红

地处欧亚交界,又被中东地区所覆盖;既是亚洲最靠近西方的国家,又是欧洲和西方最靠近东方的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深厚的历史积淀,赋予了这片土地别样的风范与格局。

这就是土耳其。

时逢土耳其建国90周年暨2013年中国“土耳其文化年”,前不久,应土耳其总理府公共外交协调办公室的邀请,笔者随中国记者学者代表团访问了这个神奇的国度,并就传统与现代的接合、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等话题,与土方官员、学者及宗教界人士等进行了沟通和交流,颇有感触。

作为现代中东的第一个共和国,土耳其不能算“老”,但其所在的这片土地,曾经孕育过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它的“根基”,乃是历史上一度称雄四方、让欧洲许多国家都闻风丧胆的奥斯曼帝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行政教合一专制统治已有600年之久的奥斯曼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时间,这里成了政治势力大角角逐的场所,甚至本土都有被列强瓜分之虞。值此民族危亡之际,陆军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毅然发动民主革命,推翻帝制,驱逐强敌,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当时的民众从思想意识上划分为两派:一派欣赏、迷恋既往时光,因传统或宗教情结而反对变革,抗拒着现代化的元素,希望在墨守成规中寻找出路;另一派则坚信国家必须效法西方模式,至少学习其行政和军事